



“感恩中国给我有意义的工作机会”

对话“当代白求恩”德国医生夏爱克

本报记者田朝晖

在云南行医扶贫 15 年的“当代白求恩”夏爱克，“莫道己长，施恩勿讲”，低调得超乎想象，他一再表示不愿接受采访。在记者多次争取后，他终于接受“微信采访”。一旦定下来，他对待每一个问题，认真得同样超乎想象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
“中国扶贫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”

记者: 是什么让您在中国偏远落后山区坚持了 15 年?

夏爱克: 第一, 中国朋友真诚、热情地接受我们老外。第二, 德国朋友的支持和鼓励。

中国朋友的真诚、热情, 不仅让我感动, 我太太也很感动。对我太太来说, 离开德国一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。2003 年, 我们打算回德国一趟, 刚好是“非典”时期。我太太很想家, 犹豫回去后是否还回来。鹤庆人民医院的施院长专门来我家, 很热情地希望我太太再来鹤庆, 她很感动, 不再犹豫了。

随着我们对中国朋友的感情越来越深, 每次回德国, 都期待再回到“第二故乡”。而且我中文水平慢慢提高了, 培训质量和效率也在提高, 教学方法越来越合适, 各家医院的邀请越来越多, 我感到在中国我有用武之地。

记者: 您在中国的 15 年, 哪些变化让您印象深刻?

夏爱克: 首先是新农合。在我职业视野里, 新农合是中国很重要的进步。在县级医院, 新农合之后患者数量是原来的三倍。为什么? 难道现在疾病发生率比以前高了吗? 当然不是! 这是由于新农合让农民都能得到医疗服务, 有病就医、能医了。

还有交通。我们最初到鹤庆, 整个县只有一条由南到北的柏油路, 下乡镇的路都是“包谷路”, 到村子里的都是土路。现在县内有高速公路! 开始的时候私人没有车, 现在车多得都有堵车现象了! 当然不是! 这是由于大家都喜欢进口的产品? 这是发展过程中的矛盾, 我希望越来越少。

不管怎样, 中国人应该更自信。当初在鹤庆时, 每当听到有人说“我们太落后了”, 我会感到不舒服, 因为在我看来, 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值得珍惜, 不应有自卑情结。事实上, 中国的扶贫就很了不起, 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记者: 您为什么还是回德国了?

夏爱克: 有多方面的原因。最重要的是我太太。她跟着我来中国 15 年了, 想回德国发展她的专业。为了公平, 在红河服务到期后我应该陪她回去。第二, 孩子从国际学校毕业了, 要回德国上大学。第三, 我父母老了, 可能需要帮助。

但我真的不想离开红河, 舍不得! 心里很难过。

“我尝到了集体社会的好处”

记者: 您能想到吗? 我在云南采访时很多人对夏医生感动得落泪!

夏爱克: 我在云南收获的比我奉献的肯定多。刚到鹤庆, 虽然我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了解很少, 但本地医护人员从第一天就接纳我们, 很自然地让我感觉到属于他们的单位。无论有什么活动, 都邀请我和家人参加, 如中秋节、过年、民族节日、寺庙活动、结婚和葬礼、杀猪、房子上梁等。

我尝到了集体社会的好处。我记得, 在鹤庆县医院麻醉科上班时, 有一天一位护士带来一块饼干, 大小不超过手掌, 但她依然分享给两个医生、四个护士。

在中国的的经历使我视野扩大, 让我发现在自己的想法之外, 也有别的一样的想法, 这叫“殊途同归”吧。

我问农民的孩子有什么梦想, 她们经常说好读书, 毕业后找工作, 照顾父母。这样的孝顺也给我深刻的印象。

我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, 对德国的看法也改变了。我比以前更感恩, 既感恩德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, 也感恩中国给我有意义的工作机会, 自我满意度比以前大了。

“在中国的
经历使我视野
扩大, 让我发
现在自己的想
法之外, 也有
别的一样的想
法。这叫‘殊途
同归’吧。”

我对中国的
看法改变了,
对德国的看法
也改变了。我
比以前更感恩,
既感恩德国的
教育和医疗服
务, 也感恩中
国给我有意义
的工作机会, 自
我满意度比以
前大了。



▲夏爱克的交通工具: 人力三轮车。

前大了。

“别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”

记者: 您影响了很多人, 还有没有遗憾?

夏爱克: 决定到中国时我的理想和愿望很大, 后来发现自己能力很小。很遗憾的是, 开始几年语言能力太差, 对中国文化了解太少, 人际关系不够。

第一次回德国前, 鹤庆县医院的施院长说: 你的服务态度比医术对医护人员的影响更大。有一天, 我发现医院在外墙写了新的口号: “努力为病人提供像对自己母亲一样好的医疗服务!” 施院长很骄傲地告诉我, 医院领导新的名片后面都印上了这句话。这叫“以身作则”!

记者: 为什么您做了好事不喜欢跟人分享?

夏爱克: 别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是事。我认为没做任何特别的事, 只是做了应该要做的。我太太和我都是比较内向的人, 不喜欢被太多的注意。

记者: 您一直在帮助别人, 为什么自己遇到困难从不要求别人帮忙?

夏爱克: 自己能做的我要自己做, 因为这也是个学习过程。不过我得到了中国朋友很多的帮助, 遇到困难不需要说出来, 朋友们已经发现了。

“百姓叫我德国白求恩, 我孩子有点骄傲”

记者: 您了解白求恩吗? 在医护领域, 您有没有特别欣赏的人?

夏爱克: 跟老百姓交流, 他们常说: “你是德国的白求恩。”在中国每个孩子都学习他的故事。我孩子上小学也学过, 他们后来好几次听老百姓叫我德国白求恩, 他们有点骄傲, 但想得不太多。他们知道我们是那边唯一一个外国人, 所以也没有对比。

白求恩好像是毛泽东的朋友, 很有名。我认为还有很多为国家奉献了生命的人没有被纪念, 有点可惜。

医护领域我特别欣赏的人, 不是一个, 而是好多。15 年前在中国还没有医院, 有一些外国医生和护士来到中国, 在非常差的条件下, 很危险的地方开展医疗服务, 甚至奉献了自己的生命。

“对医生来说, 好设备不是最重要的”

记者: 听说您生活极端简朴, 但使用的医疗设备都是最好的, 比如从德国带来的听诊器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?

夏爱克: 我的听诊器也不是那么贵,

大概一千块人民币。质量好, 已经用了 28 年! 我很喜欢它的深红色, 从大学到现在一直陪我, 所以不想放弃它换新的。我觉得当医生应该尽心尽力的提供专业医疗服务, 好设备当然有帮助, 但不是最重要的, 最重要的还是专业性的态度, 得到患者的信任是我们的责任。

记者: 您怎么看中国的医患关系?

夏爱克: 医患之间如果缺乏信任真可惜。医疗纠纷太多, 必然导致一种“防护性医疗”, 增加费用, 浪费资源。

医患缺乏信任原因很多。有一点是, 很多医生沟通能力和水平需要提高。有些城市的人小看村民, 我遇到一些老医生认为农民不了解医学, 所以不愿意好好介绍。

可喜的是, 年轻医生的沟通能力越来越好。我看到, 不少年轻护士和实习生对老年病人特别好, 像对待自己爷爷奶奶一样。

“我看每个病人都一样”

记者: 大家都觉得, 您总能让患者开心, 有什么妙招?

夏爱克: 哪里哪里! 我看每个病人都一样。贫富、男女、老小、社会地位高低, 对我来说都需要一样好的医疗服务。因为我是外国来的, 不需要考虑太多关系的问题。

进入手术室的病人都很紧张, 所以我觉得麻醉科医生的主要责任是安慰他, 让他放松, 多解释要做什么医疗程序, 实施最有效的镇痛。有的病人一看我, 就放心, 因为觉得老外技术肯定好。但这不公平, 因为我也有能力很好的中国同事。

“除了急救之外, 就医生必须先去医院”

记者: 您觉得提高乡村医疗服务水平, 最关键的是什么?

夏爱克: 我不是卫生政治学的专家。这些年中国政府已经在这方面投资很多。依我看, 最大的问题是乡村医生学历太低。我发现, 乡村医生这个职业没有吸引力, 收入太低。住在乡下, 孩子受教育的机会不好。百姓也不太相信村或乡镇卫生人员的医疗水平, 随着交通和经济越来越好, 所以都要跑到上级医院看病, 这样浪费人力资源和医疗费用。病人跑走了, 下面医生的收入就更低, 形成恶性循环。

所以我建议一边把乡村医生水平提高, 一边建立完善医疗体系合理分配医疗资源。乡村医生的基础薪水必须增加, 薪水应该跟开药完全没有关系, 只跟负责的病人数有关。除了急救之外, 就医必须先去医院, 诊断后在乡村医院不能治疗的, 才能转到上级医院。

“我的家庭和婚姻有更大的目标”

记者: 您是怎么协调家庭和工作关系的?

夏爱克: 我太太性格跟我不一样, 她不喜欢去旅游, 很怕坐飞机。所以她陪我去中国, 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奉献。

孩子小时候由她照顾, 也教他们德国小学的课程。后来她帮助我接待医学短期培训班的老师。我太太是儿科医学博士, 但在中国不敢做医疗工作, 因为临床经验少。

除了夫妇幸福, 我的家庭和婚姻有更大的目标, 这是我们的秘密。肯定也有冲突, 所以经常需要说对不起。我太太做得比我好!

记者: 您在中国 15 年, 有过失落或孤独的时候吗?

夏爱克: 我天天在接触医院同事, 官员, 商店老板, 路上的孩子, 学校的学生, 所以感觉不孤独。我太太的确有些孤独, 想她德国密友。

有时会感到一些不便公开的事儿, 心里也难过。但更多的是温暖, 因为我结识了很多朋友, 百姓对我非常热情, 如在农贸市场卖菜的老板, 每次都要给我送菜!

记者: 在中国 15 年, 对孩子的影响有哪些?

夏爱克: 这 15 年对孩子们影响很大。他们俩没有一个地方完全扎根, 说不清老家在哪儿。童年的“老家”是鹤庆, 两个都很喜欢那边, 有老故乡的感觉。青年的“老家”是泰国的清迈。现在在德国念书。虽然护照是德国的, 但感觉跟普通的德国人不一样, 可能有一点国际身份。他们说毕业之后也要离开德国, 去国外。

很大的好处是, 他们的体验、视野比德国孩子宽。他们习惯与外国人打交道, 比较容易适应不同的文化。

在中国幼儿园和小学, 我的孩子学到了好的道德和态度, 如敬重老师, 认真学习、孝、竞争等, 不过, 中国的学习竞争太厉害了!

“看孩子们高兴的眼睛, 我很开心”

记者: 为什么那么喜欢小孩子? 您帮助过的哈尼族孩子陆名灯说是因为您想念自己的孩子, 是这样吗?

夏爱克: 我一直都喜欢小孩。我中文很差的时候, 跟孩子交流没有问题。有的孩子首先有点害羞, 怕老外。一送小气球, 就很高兴, 可以一起玩。看他们高兴的眼睛, 我觉得很开心。那时候山区农民的孩子什么玩具都没有, 气球让孩子高兴, 父母、爷爷奶奶也高兴。

自己的孩子去泰国读书后, 肯定想他们。名灯说的也是对的。

记者: 为什么想到要去福利院做公益?

夏爱克: 我女儿从八岁之后一直都说长大了要建孤儿院。到了红河第一年, 有一天院长通知我, 医院邀请孤儿院免费体检, 请我参加。我陪孩子们从一个检查站到一个检查站。他们都有点紧张, 特别怕抽血。突然一个男孩拉我的手, 我就鼓励和安慰他, 最后记下了福利院师傅的电话。

女儿放假后, 我就跟福利院联系, 他们欢迎我们跟孩子们玩。我们准备了水果、零食、饮料和很多游戏, 整个下午玩得很开心。此后我女儿每次放假都会去, 我认识的学生听说我们去孤儿院, 也要一起去, 所以每次我会带一两个小朋友去。初中、高中的, 澳大利亚的大学生, 都有。

我以前听说中国有些孤儿院对孩子没有爱心, 但红河福利院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。

记者: 听说您回德国后想帮助中东难民, 进展如何?

夏爱克: 对, 我在教两个叙利亚家庭德文。因为自己有过这样的体验, 所以我很了解当外国人是怎样的感觉。我也知道适应陌生环境最需要的是沟通, 所以决定帮助他们学德文, 每星期两次。

“我和太太都用中国手机, 但很多中国人想买 iPhone”

记者: 大家说您鞋子、手机和背包多年不换, 为什么这么简朴?

夏爱克: 第一, 从小学过不要浪费。我父母在二战中长大, 有 5 个孩子。父母的价值观也影响我, 买书要买好的, 其它不要花太多钱。

第二, 跟环境保护有关, 每一个产品都会增加环境污染。

第三, 来中国是朋友支持的, 所以我觉得有责任, 不要浪费他们的钱。

2001 年底在昆明买了第一部手机, 以前在德国没用过。这部诺基亚手机用了 9 年, 后来在红河买了中国国产手机, 直到现在都很好用。

您看最后我成了中国通, 和太太都用中国手机, 但很多中国人想买 iPhone。

这几年穿过一双好的爬山鞋子, 穿破大概 5 双凉鞋, 还有两双棉鞋。

可能是价值观的原因, 我们不需要身份地位的象征。回德国时我太太买了一辆车龄 10 年的二手汽车, 车上有一百多个冰雹砸的凹痕。

但无论在中国或德国, 我们都买了很多书。

记者: 都是哪一类的书?

夏爱克: 我特别喜欢看游记, 亚洲的比较多。我也喜欢文学、大自然和中国文化的书。我太太买了很多心理学、心理咨询的书。爷爷奶奶寄给孩子们很多德文书, 我们买了很多英文的, 给孩子们准备的。我每天晚上给两个孩子讲故事, 一起看书, 坐长途车或在度假时也给他们读一本书, 虽然他们已经是青年人, 但这就是我们的家庭习惯。

“要了解现代中国, 必须了解历史上的中国”

记者: 为什么那么爱穿民族服饰, 比如火草衣?

夏爱克: 我很喜欢所有的手工, 特别是传统服装。我觉得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中, 有很多很珍贵的能力、技术和美, 包括语言、故事、节日、歌曲和舞蹈。云南是中国民族文化最丰富的地区, 如果这些文化被放弃, 最后只能在博物馆参观, 没有生命, 就太可惜了! 在旅游景点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歌舞, 但都是假的! 所以, 我穿民族服装是为了表明我珍惜他们的文化, 想增加他们的自信。

记者: 大家说您喜欢中国传统文化, 喜欢的元素有哪些?

夏爱克: 对, 我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! 要了解现代中国, 我们必须了解历史上的中国。从文字开始, 中国的建筑、艺术、手工、哲学, 我都很喜欢, 好像到处都有象征意义! 可惜我的中文水平不够, 还不能欣赏文学。

我欣赏很多无名的老百姓, 认真做事的农民、学生、老师、护士、医生, 等等。